

# 当代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及限制

——关于布尔迪厄思想的理论论争与本土考量

刘祎莹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关于教育、文化和阶层分化的研究中,最典型的是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其暗含教育作为一种符号暴力,正在帮助中上阶层实现文化再生产,从而成为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隐形手段。在布尔迪厄理论思想发展和盛行的过程中,也引起了迪马乔、伯纳德、科尔曼等人的对话和论争,这种论争试图打破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绝对性色彩,将社会客观事实之外个体的文化流动性、交互性、能动性纳入考量范围。在文化再生产理论发展的时代对话和理论对垒中,对当代文化再生产可能性的探究将为教育与阶层流动的适切性、本土性和发展性等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理论对话;情境审思;本土特性

## The Possi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in Contemporary Era: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Local Considerations on Bourdieu's Thought

LIU Yiying

(Colleg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lated studies 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class division, the most typical theory is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presented by Bourdieu, which states that education is becoming a kind of symbolic violence, and is an invisible path to help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achiev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further aggravat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tratum solidific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evalence of Bourdieu's theory also sparked dialogue and debate among DiMaggio, Bernard, Coleman and other scholars. They tried to break the absolute argument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brought cultural fluidity, interactivity,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beyond social objective facts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whether the children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can achiev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analyzes the dialogues and 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guide the local research to further reflect on the relevance, locality,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class mobility.

**Keywords:** cultur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capital; theoretical debate; situational reflection; native characteristics

在当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无疑掀起了一场以文化视角研究社会阶层和教育公平的浪潮。正因如此,在探讨社会阶层再制问题上,布尔迪厄的理论被广泛追捧,甚至延

伸至艺术、经济、文学等领域,并带动一系列“验证文化再生产”的研究趋势。当代文化再生产的“预言”会延续还是打破,需要回到文化再生产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如下问题做出回答:文化再生产理论

如何产生?其实现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制约其发生?重新梳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时代对话和实践论争,将有助于结合本土语境切实思考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复杂性。

### 一、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生成逻辑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在理解社会结构方面,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已不单纯从二元对立角度看待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也不仅仅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与行为。在这一时期,布尔迪厄通过一系列作品,包括《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1964年)、《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1970年)、《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1979年)、《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1989年)<sup>①</sup>,逐渐建构起一套解释社会二元对立之外更为细致的视角和框架,即文化再生产理论。布尔迪厄试图从文化角度揭示社会结构固化和阶级分层的深层原因。

#### (一)“继承人”背后的隐性线索

1964年,布尔迪厄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社会出身与他们的高等教育机会、学习态度和能、适应大学的能力、学习成功率、专业选择等方面相关<sup>[1]24</sup>。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学中的学习方式、课程或者教师有所不同,而是在大学中的文化行为和学习行为表现,可能要推及更早期的家庭教育。

随后,布尔迪厄通过研究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知识、技能、艺术爱好和成绩的差异,看到家庭出身和家庭教养的重要性。这种“出身”包括了社会阶层、经济投入、家庭环境、教养方式、爱好习惯等各个方面。相对于经济和物质资本而言,更隐秘的一种优势是家庭的文化资本。“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造成了大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在大学中学习学术文化方面只是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使他们分化的恰恰是与其出身阶级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系统。”<sup>[1]30</sup>这种“特权”不同于直接运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而是通过隐性和间接的方式传递。恰恰是针对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调查,使得布尔迪厄意识到出身、教育、特权之间隐约的联系,也注意到中上阶层子弟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之外,另一种隐性优势是家庭教育的作用。不过,它们之间具体有什么样的连接性,在《继承人》一书中还没有完全厘清。

#### (二)洞察:中上阶层的文化再生产优势

布尔迪厄在1970年出版《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

理论的要点》一书,逐渐展露出更大的理论野心和对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相对于《继承人》中对高等教育和学生家庭出身的局部分析,《再生产》论述的对象对准了整个教育系统,包括各个阶段的学校教育和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他将教育活动与社会阶层的权力关系连接起来,认为教育活动是为阶层权力服务的一种隐性途径。恰恰是在思考教育行为作为一种符号暴力时,布尔迪厄提到了“文化再生产”一词,更明确指出“教育行动使得它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从而有助于作为它专断强加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再生产功能)”<sup>[2]</sup>。布尔迪厄正是在研究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时,看到教育系统正承载着知识传递需要之外的功能,这是一种帮助阶级划分和文化专断的可能性。在实施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教育的内容、知识、文化等更容易契合中上阶层的习惯和生活内容,甚至与他们的权力息息相关。因此,教育过程无形中使得中上阶层实现了文化再生产,而这种文化再生产明显又为进一步的社会权力再生产服务。

正是这种环环紧扣的关系,使得各个阶层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主动去靠近和了解教育中的文化准则。一旦人们忘记文化需要是一种教养的需要,直接把文化需要与生产它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便加入了这样一个文化再生产的圈子。所以,布尔迪厄试图揭示文化再生产是契合中上阶层的一套完备的系统化方式,教育中的文化专断使得人们主动接受或遵循这一规则。只有符合这一圈子内的规则,其所获得的认同和价值才是有效的。至此,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已经逐渐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

#### (三)文化再生产的操作化与运行机制

文化再生产机制何以运行?这是布尔迪厄建立理论体系所要阐释的问题。在1979年出版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他详细说明了文化再生产真正的运行机制起源于家庭。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是个人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也是造成人们生活品质差别的重要因素<sup>[3]</sup>。各个阶级努力通过提升品位将自身和其他阶级区别开来,而对文化资本的占有程度不同恰恰导致各个阶级品位的差异。

在整个文化再生产的运行机制中,文化资本、惯习和场域成为实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布尔迪厄在芝加哥大学的研讨班上,向学生呈现了他的理论框架,即通过“惯习”“资本”“场域”之间的三元关系来解释社会分化的内在原因。“每个场域就像一个游戏圈,人们在遵守游戏规则和再生产游戏的情况下,通

过参与游戏增加自身资本,拥有更多符号数量,才能投身游戏或者进一步改变游戏固有的规则。而一个行动者的资本本身又是习性的产物,就像场的特性就是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使在场域中操作的行动者的习性得以具体化。”<sup>[4]</sup>因此,社会上层阶级把自己的惯习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融入家庭教养与学校教育之中,使其子女更容易与体制相合从而取得学业成功。文化资本通过社会阶层出身和社会阶层中无意识的行为和惯习来实现,而这一过程势必会烙印着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的最初痕迹。尽管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个别行动者及其表现能力,但它却可以通过教育过程实现一种隐性的代际继承和传递。

布尔迪厄将具有文化资本的中上阶层人群称为“文化贵族”,并认为他们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实际上就像贵族对自身爵位的传递和继承。而这种“爵位”的作用体现在:“从家庭继承的文化资本与学校教育资本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资本是由家庭保证的文化遗产和学校保证的文化遗产的积累作用予以担保的产物。所以,文化贵族爵位的持有者存在一种血缘、一种过去、一种传统的维护。”<sup>[3]32-33</sup>因而,文化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在童年时期的家庭中就已逐渐展开,并逐渐延伸至学校和社会场域。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而这本身就形成了文化贵族的惯习和趣味。这种无意图的训练包括音乐品位、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生活风格,使得孩子在成长中逐渐获得一种合法性文化配置。这种自然倾向的文化配置使他们的身份得以延续,并与他人区分开来。通过无意识训练的惯习形成一种再生产的策略,目的是维持间隔、距离和等级关系,并在实践中无意识地推动构成社会秩序差异的体系进行再生产。

#### (四)“精英选拔”策略的再审视

十年后,布尔迪厄重新审视高等教育领域,推出《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但显然他对于权力和文化再生产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也进一步看到美国宏观制度情境的内在逻辑:学历是保证着国家精英的一种“普遍修养”,但国家精英产生背后更是一种选拔性的制度化仪式。布尔迪厄指出:“通过建立一种秩序,一种对于社会世界的合法性划分方式,精英学校以分离和聚合完成了倾向于产生精英群体的转化过程。学业精英优秀个体的集合通过学业评判合法地建立起的分类等级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已经存在的个体分类等级。社会关系虽然不能在这里

比较,但它们在技术上可以相互取代。”<sup>[5]171-172</sup>

在精英选拔的内在逻辑中,布尔迪厄洞察到一种权力场域结构和再生产的策略体系。再生产策略并不是与霸权有关的显性实践,而是一种精细而又理性的计算,是一种未雨绸缪的规划。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将文化再生产解释为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原因之一,这一再生产过程有着中上阶层对合法性文化的主动符合以及对教育制度情境的主动契合。这种隐性的文化专断和精英维护,在布尔迪厄的眼中可能是社会阶层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

布尔迪厄通过多年的研究和理论提炼,建构了一套从文化视角深度解释社会分化和差异的理论,试图打破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解释阶层分化的内在冲突到底源于何处。他将文化再生产机制延伸到社会再生产的五个关键领域:学校教育系统、权力正当化、生活风格和品位、语言象征性权力与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再生产机制<sup>[6]</sup>。该理论从微观层面揭示文化资本在家庭场域对个人成长和惯习养成的渗透影响,连接学校教育从而形成一种合法性的文化专断,进一步验证一种趋向文化炼金术的宏观制度情境。由此,布尔迪厄以文化为引线,从微观到宏观推导出文化再生产的逻辑,阐明了家庭、学校、社会场域中惯习、资本与再生产的关联性。

## 二、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对话与实践印证

毋庸置疑,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引起了对于教育、文化与社会阶层问题的广泛关注,也促进了更多冲突论社会学者关于再生产问题的理论对话。这些理论观点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在文化再生产的话题下同样成为印证其可能性的脚注,它们从制度情境、学校教育、家庭养育等维度试图回答文化再生产发生的条件、运行范畴、具体情境,并进一步与文化再生产理论所凸显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进行对话。

### (一)制度情境中的文化功能取向

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实践中得以确立的关键在于:在宏观制度情境中,以教育和文化为载体的再生产运行机制是一种合理配置。当是否具有文化成为一种衡量社会身份和教育程度的标准时,它便有了成为资本的可能性。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教育与权力的敏锐度,带来了关于教育制度作用方式的新认识和洞见。这一点在柯林斯的研究中也可窥见一斑。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进而提出“职业地位财产”(property in occupational position),表明“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在物质或财务上的有形财产之外,产生了一种职业地位至上的无形财产,即闲职(sinecure sector)”<sup>[7]</sup>。柯林斯看到学校文凭作为一种文化货币的意义和社会作用。文凭社会的到来,使得“文化”成为一种可以转换成其他资本形式的变通“货币”。问题在于:谁有资格得到这些闲职?或者说社会以什么标准选拔这批人?过去是凭公考的等级身份,而现在则是依靠文凭(证书)。因此,文化通过教育的形式,一方面传递知识、塑造人的品性和仪态,同时也在现代社会的筛选体制中以文凭的形式流通,进而转化为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

教育选拔机制是文化再生产效应最为凸显的“窗口”。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精英大学,获得更好的文凭和更高的学历呢?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一书中进一步回答了这一问题。这项实践研究通过对哈佛、耶鲁及普林斯顿三大美国高校的入学标准和选拔机制进行分析,揭示精英大学选拔标准中潜在的社会阶层差异。精英大学旨在选取具有“才能”的人,但“才能”并不是一个中性词,它蕴含着社会以及社会各个群体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它只对一部分群体有益,同时不利于另一部分群体<sup>[8]</sup>。相对而言,社会出身和家庭资本决定了获取“才能”的资源 and 更大可能性。杰罗姆的研究发现,由于熟知精英大学的选拔准则,中上阶层的家长热衷于培养孩子除学习以外的“一技之长”。通过送孩子参加各种足球、篮球俱乐部或者音乐演出,让其较早地脱颖而出,从而更好地符合精英大学的选拔标准。因此,在教育选拔制度背后充满了市场精神和排名竞争的压力,也在维护美国社会阶层秩序的过程中暗含着特权录取、招生中的权术以及公平表象下的现实问题。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进一步印证了美国社会制度情境里的一种精英选拔机制。他指出:“尤其对于高中和大学来说,一头连着家庭所打下的童年基础,一头连着未来成年的事业发展。大学的门槛虽然降低,大学生中各种阶层出身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大学录取中的阶级鸿沟却始终存在。”<sup>[9]</sup>这意味着对于出身底层的孩子来说,上大学

容易,但上好大学更加困难。随着选拔机制的多元化,除了学业成绩外,更多的能力和潜力被考量在内。进入高等教育的过程不得不与家庭出身、父母教育方式、童年成长环境和课外活动机会等联系起来<sup>[10]</sup>。因此,看似实行自主申请的选拔制度,在公平的外表下,依然可能存在阶层差异和无法更改的命运。

对于选拔制度和文凭社会的分析背后,冲突论社会学者显然看到教育和文化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隐形资本在宏观制度情境下的选择性倾向和符合性特征。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的说法:即使不同阶层的学生进入同一所大学,其社会出身依然在施加着关键的影响。这体现为学业和未来发展上的不平等,在职业选择、学业选择、工作环境和社会条件等方面,都可能会让一个人感到是否“如鱼得水”或者“很不自在”。

## (二)学校教育中的再生产与知识性权力

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冲突论社会学者对外部制度情境的关注,与布尔迪厄同时代的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从微观的知识社会学角度对教育实践的内在逻辑给出了进一步解释。从某种意义上,他赞同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部分观点,认为文化再生产研究范式的逻辑大概是阶级关系产生了文化偏见,选择性地作用于教育关系,随后教育知识的选择、组织及其传递都服务于相同目的,“集中”或“放大”社会等级固有的偏见<sup>[11]</sup><sup>68</sup>。

尽管伯恩斯坦认同一种可能存在的文化再生产,但也指出布尔迪厄等人在文化再生产理论论证中的最大问题,即:在描述看似中立而实质利用符号权力和利益的教学实践时,没有澄清教学实践如何竭尽所能地行使符号暴力,也没有阐明特定教育知识及其传递过程如何再制宏观社会等级结构<sup>[12]</sup>。因此,伯恩斯坦强调一种基于学校教育中教学话语的建构模式。他指出:“生产场域是新知识建构的地方;再生产场域是学校教学实践发生的地方;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场域,称为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sing)场域。这个场域的活动主要是从生产场域占用话语,再将之转化为教学话语。”<sup>[11]</sup><sup>212</sup>伯恩斯坦看到文化再生产在学校教学机制中的运行逻辑,实质上是存在一种象征尺度、管理意识,一定意义上拥有控制意识的权力和评估意识实现的合法性。

伯恩斯坦对学校教育中的知识传递和教学实践的研究无疑开启了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从外部制度情境研究走向深入学校情境和微观课堂研究的大门。

随后,英国社会学家迈克·扬(Michael F.D.Young)、美国教育学家迈克尔·阿普尔(Michael Apple)都受其影响,着重在知识社会学领域看到学校场域作为一种社会炼金术的可能性。阿普尔甚至更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网络是通过意识形态来维系的。在学校教育中,除了教科书,这种意识形态也通过‘潜在课程’在教育系统中运行并发挥作用。”<sup>[13]</sup>因此,看似符合逻辑的课程设置或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契合优势阶层的符号暴力和特权。它们经由知识的分类、架构和表达而隐性地将一种看不见的特权和契合优势阶层的话语体系渗透在教育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传递来逐渐形成合理的文化体系。

对于学校中课程与知识的专门化分析,使得教育社会学家进一步将关注点延伸至学校教育中的教学实践过程。美国的波普科维茨教授(Thomas Popkewitz)运用社会认识论研究教学、指导和课程实施过程,发现课堂师生行为和思维过程可能也存在一种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他通过《心塑历程——学校教育机制和教育培养体系的反思》一书揭示学校所强调的“社会层面”理性的发展流变,试图解释教育工作者如何通过排斥一些孩子来努力达到所谓的“公平”。研究发现,教师可能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以“双重姿态”(double gestures)模糊的理念或情感为名,来隐性作用在对不同学生的期望中<sup>[14]</sup>。因此,在学校文化建构中,理性与标准背后的“生产性权力”作用于课堂教学和师生关系,在学校权力关系中的冲突与矛盾、控制与反控制、共生与共治之间都可能包含着隐性的生产性权力和权力制衡。

显然,知识社会学领域对于学校教育中课程知识、分类架构、教学过程等方面的细致分析,不仅说明知识的“双重建构”特性,也进一步发展和印证文化再生产在学校教育中如何进行权力再制和合法化,学校教育成为阶级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合法机制和场域。同时,知识社会学者显然也看到了知识的“双重社会性”。一方面,知识边界源于社会边界,知识结构有其社会的决定性因素<sup>[15]</sup>。另一方面,一旦知识边界被确立起来,它的集体性质就使其具备一定的自主性和实在性<sup>[16]</sup>。因此,学校教育的生成性和主体性又可能是打破文化再生产所确立的社会边界和阶层差异的关键。

### (三)家庭教育的阶层差异与教养策略

在整个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布尔迪厄承认外在制度环境和学校教育对于再生产逻辑的影响,但他更强调家庭场域作为文化再生产实践的初始地,承载着一

种来自出身和阶层分化的不平等。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被认为是布尔迪厄理论的最佳“推广者”。相比于布尔迪厄和伯恩斯坦,她更专注于不同阶层家庭教育和培养方式的对比,进一步将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进行细致的操作化应用。

安妮特·拉鲁在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发表多篇文章,试图对不同阶层的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投入时间、孩子的惯习培养、家校合作中的文化资本作用等进行探析。她既将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及资本理论运用其中,又进一步将“文化资本”精确为一种机制化的、被广泛共享的、高水平的文化信号,它被用在解释社会和文化的排斥问题(态度、偏好、形式知识、行为、目标和证书)等方面<sup>[17]</sup>。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对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进行研究,发现中上阶层家庭主要采取协作培养的方式,父母借助由自己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尤其是业余爱好活动),确保孩子有更多的体验经历,使他们敢于向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而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则偏向于成就孩子的自然成长,即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家长们倾向于下达指令,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孩子们做事情,最终在孩子心中形成一种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因此,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在社会机构的“真实世界”或“文化技能库”(cultural repertoires)中具有更多经验<sup>[18]1-4</sup>。

除了探究社会出身在家庭内部对孩子产生的不同影响外,拉鲁还试图对家庭与学校的隐性关联进行探讨。她用人种志的方法去研究父母的社会资本对学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社会资本与学生学校表现的相关性问题,成为美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拉鲁在研究不同阶层的家长对学生教育的参与情况时发现,不同阶层的家长在孩子的学校活动中参与的程度和广度存在差异,这背后正是家长运用其自身的社会资本促进孩子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sup>[19]</sup>。也正是因为这一研究,拉鲁进一步提出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不仅要看谁拥有这些资本,更要看这些资本是怎样被个体使用的,学校对这些使用方式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以及学校在社会成层中扮演的角色和这种成层所形成的时间和特征<sup>[20]</sup>。这一点相对于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的绝对论色彩,似乎发现了再生产运行中更大的讨论空间。

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对话和实践印证中能够看到上述社会学家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补充和延伸,

也进一步揭示出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即使在当代社会,外部制度环境对于文凭的技术功能倾向和精英选拔逻辑,仍在造就一种符应再生产的合法性文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联和迁移,使得文化资本和教育优势成为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以象征符号的方式可以转换为其他资本形式从而维护这套文化再生产的逻辑体系<sup>[21]</sup>。因此,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教育和文化被赋予技术功能论的色彩,与阶层和社会再生产关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由外到内严密的社会再生产闭环,但也容易陷入一种“唯冲突论”的命题中,强化了由教育与文化承载的功利主义和理性选择,而低估了个人和文化模式自身的动力。

### 三、打破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

社会学家强调阶层优势在教育代际流动中的作用,往往进一步印证文化再生产的合理性。文化再生产的理论推敲和实践印证中,存在着一种主观选择的契合性,从而形成了一种看似逻辑自洽的闭环。然而,依然有不少社会学家基于各种角度对其提出质疑,形成了围绕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理论论争,试图打破文化再生产的绝对性,看到其中的理论缺口和局限,阐释社会阶层流动和文化功能的多种可能。

#### (一)文化功能的多重诠释

尽管文化再生产理论从外部制度情境印证着一种契合优势阶层的文化符应逻辑和选拔机制,强调社会结构的阶层固化,但这种绝对色彩使得教育和文化的功能解读过于窄化。诸多社会学家通过对文化功能的多重诠释试图挖掘文化在技术功能以外的性质、传递过程和生产过程,冲击着文化再生产理论所强调的“群体精神”。

社会学家迪马乔(P. Di Maggio)从外部制度环境角度对由文化再生产引起的社会结构固化现象提出质疑。他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城市化推进、教育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再局限于小范围封闭的社会交互群体,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扩大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场所中习得文化资本。”<sup>[22]</sup>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恰好抓住了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漏洞,其在回答阶层与文化资本传递问题时尖锐地提出,尽管中上阶层家庭在资本积累上占据着优势,但文化资本的传递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社会经济资本的传递相对简单。因此,精英阶层的家长可能更重视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而较少将精力投入在营造家庭的高雅文化环境上。其结果可能是,他

们的子女既不知晓文化资本的运作,也不重视文化资本的作用。与之相反,底层家庭的子女虽然家庭缺乏社会经济资本,但文化资本可在学校中习得。因此,他们将更加重视文化资本的作用,在学校场域通过教育过程中获得优异的成绩和文凭逐渐创建自己的文化资本,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以此缩小他们与精英阶层子女的差距<sup>[23]</sup>。文化流动理论打破了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的绝对色彩,不再承认外部制度环境的固化作用,反而强调一种文化资本传递的主观性和生成性,也进一步印证了现实中“寒门出贵子”或者“富不过三代”等现象背后社会阶层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对手除了迪马乔,还包括强调文化选择过程本身的斯威德勒(Swidler)。他提出的“文化工具箱理论”并不是将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形式来看待,反而强调形塑我们行动的文化更多是以“工具箱”形式出现,包括礼仪、方法、习惯、风格、时尚、技巧、能力与实力等<sup>[24]</sup>。它们不是为了符合某种阶层或主流文化而被甄选或再生产的形式,而是为了服务于人们生活的具体社会情境。因此,文化可以被视为生活工具,能够为人们的行动过程提供策略,而不是为行动的目标提供价值意义。行动者如何采取行动与其工具箱内的储备有关,更与其如何选择工具的策略过程有关。每个人都会结合自己对所处情境的理解从工具箱内选择合适的工具,并遵循其指引而行动。

从文化的功能取向来看,文化再生产理论看到了在制度情境中文化的技术功能和作为资本的传递性和符应性,但却忽略了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生成性、流动性和过程性。这也使得文化再生产理论同样被很多微观社会学者所诟病,其中包括兰德·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和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前者尽管认同冲突论的存在性,但也强调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互动仪式链”,这一互动链在时间上经由具体情境中的个人之间的不断接触而延伸,从而形成了互动的结构;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际遇过程,并使这些际遇发生的自然空间扩展之后,社会结构就变得更为宏观<sup>[25]</sup>。因此,柯林斯强调更应该注重文化本身包括仪式在互动连接中的生成性,而非一种基于技术功能的再生产策略。同样,保罗·威利斯也看到文化的一种生产性特质:“文化的特性在于社会能动者‘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处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sup>[26]</sup>

正因如此,社会学家关于文化本体论功能的论争进一步形成了对于文化功能的多重诠释,这也从侧面打破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只从社会结构分化看到的文化资本功能,反而忽略了文化与个人之间的连接关系。

## (二)学校与家庭教育中再生产的危机

在关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实践论证中,尽管多数研究通过阶层优势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的契合程度来验证文化再生产理论,但也同样看到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下伴随阶层优势可能存在的危机和困境,从而呈现出教育代际传递和文化资本继承的复杂性。

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萨莉·鲍尔(Sally Power)等人曾运用经验研究范式对教育与中产阶级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撰写了《教育与中产阶级——一种务实、细致而持久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一书。该书通过对英国300名来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历时十余年的跟踪调查,试图勾勒中产阶级内部如何区分阶层以及如何保持其教育优势,但却发现了阶级优势下看似平坦的发展轨迹实际可能存在的“困境”,优势阶层的子弟在发展中并非理所当然的一帆风顺,他们的成长跌宕起伏,实现文化再生产并不容易<sup>[27]</sup>。

这一点即使在文化再生产实践最为凸显的精英学校也开始出现缺口。美国学者威廉·德雷谢维奇注意到近些年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学生逐渐趋向于一种精英主义。这些一路考上名校的孩子就像是公认的“斗士”,他们不断地在达到一个目标后追求下一个新的目标。他们的爱好广泛,但缺乏深度的爱好和情感。在他们身上有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成功的压迫感。因此,研究者将这些孩子比作“优秀的绵羊”<sup>[28]</sup>。“高处不胜寒”的处境使得他们不得不时时刻刻保持一种“备战”的状态,害怕被比下去,害怕不能成功。他们谨慎、小心却没有安全感,一旦出现失误和失败,就会放大自己的缺点,对自己产生否定心理。

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也曾经暗示,中上阶层尽管在持有资本方面具有优势,但维护自身阶级性和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越来越不易<sup>[5]256</sup>。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在社会场域中,人们的生存过程就像在爬山一样。即使是那些已经进入精英大学并拥有文化资本优势的孩子们也有可能是在教育的标准与功能、价值与意义方面产生深刻且溃败性的影响<sup>[29]</sup>。这些光环下的“教育遭遇”可能正是在国家精英选拔制度与文化秩序之外,未关注到的精英养成过程中文化资本缺失和文化断裂的现象。

除了学校情境中文化再生产的潜在危机外,在家庭领域中,尽管布尔迪厄看到了文化资本占有者的文化再生产优势,却没有考虑到文化资本在传递过程中的联结性。文化再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实现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科尔曼(Coleman)从文化再生产的内在传递机制出发,通过对家庭内部社会资本重新解读指出文化再生产可能存在的破绽<sup>[30]</sup>。科尔曼在研究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时发现:家庭中亲子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种封闭性网络,也是社会资本在微观情境中的流通形式。家庭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流动取决于代际交互过程。对子女学习的影响取决于家长对教育责任的认知,陪伴和教育子女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如同教育投资。可见,家长教育投入的时间长短影响社会资本的强度,进而影响文化资本的传递,也影响着子女的教育成就。换言之,欠缺密集的亲子互动,家庭内的网络结构便会出现断裂而达不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优势阶层家庭就无法将文化资本转移到下一代<sup>[31]</sup>。这无异于为文化再生产的实现提出了更多的限制条件。

## (三)个体社会学冲破再生产群像

文化再生产理论体现了一种教育和文化的技术功能论特质,忽略了在这套再生产机制中文化的多重功能、学校与家庭内部的互动链接关系,更容易忽略群体论证中的个体因素。作为个体的人,在实现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是否愿意接受或者产生拒斥?个体的主观性对于文化再生产的选择倾向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即使个体具有文化再生产的可能性,如果不愿遵从一套文化再生产的逻辑而选择“另辟蹊径”,则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再生产的主观剥离。

法国社会学家伯纳德·拉尔(Bernard Lahire)作为布尔迪厄的徒孙,却站在批判布尔迪厄的一端。他尖锐地指出:“文化再生产理论实质上是扩展实证研究的对象,以使得更多的情况囊括到方案的‘通用性’中,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关于经验问题的懒惰。”<sup>[32]</sup>可见,拉尔对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并不信服,他甚至认为布尔迪厄只是通过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对过去的社会化方式呈现了中上阶层的普遍优势,但对群体内部个人的心理结构、情感维度、性格特质等没有具体说明。正因如此,他批判布尔迪厄在著作中只用了“养成的性格、适当的审美气质、构成习惯性的性格、苦行者的美德和文化、在学校获得严肃态度、继承性格”等表述,没有用精细的语言去勾画优势阶层子弟个体在成长历程中遵循的规律和限制因素,只是从社

会实践中推导出来的群体色调<sup>[32]</sup>。另一位社会学家保罗·韦恩(Paul Veyne)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指出:“以集体良知的名义对所有社会代理人 and 任何时间的归因是一种错觉,实际上只适合少数高级人才的所属时间或精巧时刻。”<sup>[33]</sup>布尔迪厄本身的绝对化判断,导致文化再生产理论具有强烈的阶层倾向。

为了打破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再生产的论断,拉尔看到布尔迪厄一直专注于社会再生产问题受家庭、学校和各种社会文化机构的影响,却忽略了再生产的内容和在什么方式下文化资本会自我复制等问题,这导致了一种“过分完整”的再生产理论,也形成了一种关于群体精神的论证逻辑。因此,他从个体社会学视角出发,看到个人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活动是社会过程的产物,这也可能导致社会影响下行为的变与不变。因此,个体社会学的考量无疑是有别于“文化再生产”群体色彩的新论调。结构化的社会出身可以通过个人的异质性发生改变。文化的流动性、社会资本的封闭性、家庭教育的情感输出等因素都正在试图诠释一种群体论调与个体化生产之间的博弈,也逐渐将社会学家的目光引向关注群体特征之外的具体差异。

#### 四、关于文化再生产的本土考量与阐释

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发展脉络中的理论论争和实践对话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研究教育流动与阶层分化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在引入和借鉴文化再生产理论时,需要思考以下问题:文化再生产在当代中国本土语境中存在的可能性是什么?它是否仍按照原先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还是换了一种方式或以更隐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从文化再生产理论中还能生长出什么新视角?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文化再生产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进一步审思。

##### (一)文化再生产的复杂联结分析

在当代本土语境下文化再生产何以可能,不仅取决于对文化资本类属的探索,还取决于如何实现文化资本的传递过程。显然,文化资本不能以器物形式实现代际的直接传递,而需要通过家庭社会资本和情感联结来实现。换言之,文化资本只有借助家庭内部適切、恰当的代际关系才能实现传递和继承。

在现实的家庭文化资本传递过程中,如果父辈疏于对孩子的教养和情感、时间投入,在孩子成长需要吸收知识养分、文化熏陶甚至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学习力时,并不能有效进行情感投入,则会在家庭内部的闭合型链接中形成缺口。另一种情况在于,过分紧密

的家庭闭合链接一定有效吗?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拉鲁用汉德隆一家的案例来说明什么是“跑偏了的协同培养”<sup>[18]</sup>。家长们投入过多的精力,将孩子的时间“安排得过满”,使得孩子对过于紧密的家庭链接产生抵抗,则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反思在城市家庭中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精细教养”,可能恰恰是一种“异化”的协同培养。

因此,在对当代文化再生产理论进行研究解释时,需要看到文化资本与家庭内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的一种复杂联结关系。即使是具有丰厚文化资本优势的家庭,既可能因放任式教养或父母教育角色的缺席而产生家庭链接的缺口,致使文化资本传递失效;也可能因高压式教养或过分精密化的教育使得家庭链接缺少弹性和张力,反而造成“物或益之则损”的局面。因而,只有在恰当、适切的家庭内社会资本运行的基础上,文化再生产才能够呈现它自身的可能性。

##### (二)文化再生产运行的具体情境审思

用文化再生产理论阐释当代中国情境中的阶层与教育问题时,除了上述微观层面的问题外,还需要考虑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实际的宏观景象。在关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对话和流变中,也能够发现这一理论存在着群体色调的绝对色彩,这也导致将它应用于本土具体情境时,需要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漏洞。

首先,文化再生产理论中贯穿的中上阶层具有文化资本优势这一论调是否符合我国当代的实际情况值得反思。在西方很多社会学家的论述中,中上阶层群体常常作为整体与底层劳工群体进行差异对比。因此,在关于中产阶层的文化和教育问题上,多数研究者依然倾向于突出其文化优势的同质性。而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社会结构类属,这一群体实际上本身具有阶层上移的契机和下落的风险。中产阶层相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内部差异更大。因此,文化再生产理论的解释和验证更需要在具体情境和个体层面进行分析。

其次,在当代中国情境中,中上阶层子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是否顺遂值得探讨。尽管文化再生产理论以一种绝对化色彩强调中上阶层的资本优势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随着教育公平政策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2019年各地高考录取率超过80%,名校竞争变得更为激烈<sup>[34]</sup>。在这座竞争的独木桥上,汹涌而上的农工子弟成为中上阶层子弟有力的竞争对手。逆流而上的“寒门子弟”正在通过教育实现文化流动,发掘底层的文

化资本和自身的文化生产性,打破文化再生产的“魔咒”。中产家庭对孩子强烈的教育期待变为了日渐增长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来自纵向的代际流动对比,也来自横向的阶层内部的群体效应<sup>[29]</sup>。可见,在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强调的中上阶层优势,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解释,需要研究者进入阶层群体内部,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特殊性。

当然,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社会阶层中具有优势的群体如果能够遵循再生产机制,便能实现文化再生产。然而,这种说法在布尔迪厄后期的研究中也无法“自圆其说”,个体社会学中的例证再次说明个人在群体色调中的主观能动性。布尔迪厄甚至也看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背离“传统成功之道”和反文化再生产的实践行为,这与文化再生产逻辑是不符的。因此,布尔迪厄将其称为“意外”,用“自由降落”“自由决定”“英雄气概的决裂”等词来形容这种背离文化再生产的行为<sup>[35]</sup>,却不愿意深入挖掘群体色调中为什么会出现部分的“反叛”。

当我们将眼光投向中国新时代的青年群体,也同样需要思考年轻一代是否会被动地受“出身”和“特权”影响。他们中不乏违背文化再生产逻辑的“反叛者”,尽管受到阶层优势和家庭文化资本的助推,却可能主动或被动地背离文化再生产的理论逻辑,如同福柯和德里达一样,呈现一种“反体制”的性情,形成自我的文化生产之路。那些“另辟蹊径”的年轻一代,可能恰恰是反文化再生产的“先行者”,也是需要在文化再生产的群体色调之外看到的个体色彩。正如拉尔所言:“个人层面的社会学并不擅长从统计上分析非典型且不可能的例外情况,尽管这些特殊个案可能有助于清晰地了解特定问题。”<sup>[36]</sup>因此,即使是相似阶层群体中的个体或者家庭单元,也会因为生命历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变得与众不同。

### (三)理论之外的本土文化魅力

布尔迪厄的理论打破了社会二元论的研究讨论,揭示出社会阶层的差距不只是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文化资本的差距。中上阶层的这种文化优势作用于下一代成长过程中的惯习养成、学校教育甚至是未来的就业发展,使得他们在教育和发展方面都更契合社会合法性文化的规则。然而,随着文化再生产理论解释的盛行,需要更多考虑的是,在完整的文化再生产循环之下所存在的阶层之间的流动、阶层内部的文化生产和内生力量、家庭内文化资本传递

失败或断裂等多种可能性。因此,关于文化再生产的理论论争,一方面引导我们反思文化再生产理论是否过于绝对化以及可能存在的计划之外的事实;另一方面,对于文化再生产的质疑和批判,也为文化再生产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多条路径,找寻跳脱于文化再生产或文化流动群体色调之外的可能性,也更需要关照个体的复杂性和过程社会学的挖掘。

当我们进一步审思文化再生产理论本身,除了揭示一种以文化为载体的社会结构再生产以外,还可以为中国本土情境研究带来什么? 还有哪些文化形式可能成为资本? 例如,我国青年研究者程猛在底层农家子弟成长脉络中,发掘出了文化资本的新范畴。他看到了相对于中上阶层子弟而言,中国情境中的底层农家子弟身上所存在的一种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适应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这恰恰是实现其学业成就的另一类文化资本<sup>[37]</sup>。

同样,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当代中产阶层群体身上也有可能发掘出更多的本土文化资本类属。例如,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中产阶层群体身上的开拓性及可持续的动力。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里,这种开拓性是中产阶层进行文化生产、寻求阶层上移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持续的动力使中国的中产阶层群体得以快速崛起和发展,并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得以快速适应和融入。因此,我们除了看到中产阶层家庭中具象和客观的文化资本外,恰恰更需要关注在生命历程中对于外部世界不断学习的内生力量。它不只局限在知识、技能、文凭本身,而是在打开自我与世界对话的宽度,在持续更新着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在不断探索着自我能力的边界。这种内生力量是中国本土实现城乡一体化和阶层流动中宝贵的文化资本,需要再生产的恰恰可能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形式。

值得反思的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下,现代家庭在教育焦虑的加持下过分关注如何让孩子们赢在起跑线上,反而容易忽视在历史文化穿梭和文化折皱中所建构的本土文化财富。这种在阶层流动中的“勇武精神”可能恰恰是未来年轻一代需要继承的一种文化资本,并借此实现一种本土语境下的文化再生产。因此,对于本土文化资本类属多样性的探索,将有助于拓宽对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理解,在本土演绎中寻找各个群体真正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内生力量。文化再生产并不是全球化和社会竞争的砝码,我们需要看到更多本土文化资本的魅力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特性。

## 注释

①以上作品的年份按照法文原著的出版年份排序,不以中文版的译文年份排序。

## 参考文献

- [1]布尔迪厄,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2]布尔迪厄,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害[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7-18.
- [3]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4]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5.
- [5]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6]冯典.名牌大学与权力场域再生产机制的联系与互动——解读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J].复旦教育论坛,2008(5):36-40.
- [7]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3.
- [8]卡拉贝尔.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M].谢爱磊,周晟,柳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16.
- [9]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M].田雷,宋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209.
- [10]BYLSMA P E, STUBER J M. Inside the college gates: how class and culture matter in higher education[J].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018, 37(2):207-209.
- [11]BERNENSTEIN B.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12]胡雪龙,谢维和.从“浅喻”迈向“深喻”——论伯恩斯坦对“新”教育社会学的批判[J].教育研究,2021,42(12):22-31.
- [13]APPLE M W. Reproduction, contestant, and curriculum: an essay in self-criticism[J]. Interchange, 1981(12):27-47.
- [14]POPKEWITZ T. Struggling for soul: the politics of school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er[M].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1998:12-45.
- [15]DUEKHEIM É, MAUSS M.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M]. London: Cohen and West, 1970:48-50.
- [16]DUEKHEIM É.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60-266.
- [17]LAMONT M, LAREAU A.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8(6):153-168.
- [18]拉鲁.不平等的童年[M].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9]HORVAT E M, WEININGER E B, LAREAU A. From social ties to social capit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parent networks[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3, 40(2):31-43.
- [20]LAREAU A.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7, 60(2):73-85.
- [21]LAREAU A, HORVAT E M. Mom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race, class,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9, 72(1):37-53.
- [22]DIMAGGIO P, MOHR J.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marital selec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6):1231-1261.
- [23]BARONE C. Cultural capital, ambition and the explanation of inequalities in learning outcom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J]. Sociology, 2006, 40(6):1039-1058.
- [24]SWIDLER A.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2):273-286.
- [25]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4.
- [26]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文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
- [27]鲍尔,爱德华兹,惠蒂,等.教育与中产阶级——一种务实、细致而耐久的社会学分析方法[M].胡泽刚,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6.
- [28]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M].林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40.
- [29]刘云杉.教育失败者究竟遭遇了什么?[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4):7-15.
- [30]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95-120.
- [31]姜添辉,周倩.社会阶级与文化再生产——不同社会阶级家长的社会资本对文化再生产之结构化影响及其因应之道[J].教育学术月刊,2017(1):16-24.
- [32]LAHIRE B. Culture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challenging transferability[J]. Journal of Housing Research Foundation, 2014, 47(5):1095-1113.
- [33]VEYNE P. Interpretation: a proposal of choose of religion[J]. Agone, 2000(23):55-87.
- [34]熊丙奇.高考重回千万意味着什么?[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9,8(4):14-17.
- [35]布尔迪厄.学术者[M].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73-75.
- [36]LAHIRE B. From the habitus to an individual heritage of dispositions: towards a sociology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J]. Poetics, 2003(8):329-355.
- [37]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04-106.

收稿日期:2022-12-06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社科一般项目“‘双减’政策下北京市家庭培育模式转变与儿童成长机制研究”(SM202310028012)

作者简介:刘祎莹,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